

赤道線上的風土：

論新馬華人的粵謳與竹枝詞*

高 嘉 謙**

摘 要

從族裔遷徙和離散敘事的角度而言，「南來」表現了中國南方在境外的經濟與勞力流動，並象徵一個值得探究的文化與文學播遷的地理軌跡。這是新馬地區華語文化與文學的起源情境，形塑了星洲和檳榔嶼早期文人社群與文學生產。移民社會由各種方言群的離散華人組成，因此在漢詩之外，粵謳和竹枝詞是寫作和表徵土風民俗的常見形式。這不僅涉及移民主體的生存體驗，同時是語言在異地的遭遇、變異與發展，啟動文人對移民社會與原鄉的疆域思索與文化想像。

本文擬從跨境南洋的離散華人，接觸赤道線上的風土與文化，他們筆下的竹枝詞，以及大東亞戰爭期間廣府人的粵謳，如何貼近一種描述風土的形式，展開思考。

關鍵詞：竹枝詞、粵謳、南洋風土、離散漢詩、馬華文學

中國人一直把東南亞視為一個整體，稱之為「南洋」。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馬來人則把這個地區稱為「風下之地」，因為季風驅動貿易船隊跨越印度洋，抵達東南亞。上述兩種名稱都強調，海上航線是抵達東南亞的必經之路。

* 本文為科技部 106 年度研究計畫「知識體系與文學表述：二十世紀初的現代經驗與語言形式——粵音與新聲：近代知識體系的方言書寫與跨境傳釋」之部分執行成果。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安東尼·瑞德《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¹

雖然沒有季節的變化，但與季節相應的層層變化都包含在這風土之中。儘管缺乏「時間變化」，卻存在「空間變化」，能理解這點的人都認為，南洋的單調只是季節的單調，而非內容的單調。

和辻哲郎《風土》²

一、離散華人與南洋風土

中國帆船貿易或朝貢外交下的南洋，以列國志的方式進入到中國對外交通史的典籍裡，往往帶有異域色彩。寫作者的描述基本著眼地理、氣候、物產，進而風俗、人種、語言、文化，帶有民族誌的人類學意義的紀錄，為早期的南洋留下了一個紙上風貌，卻同時進入帝國秩序的下表述和修辭，獵奇的目光與偏見不言而喻。³

十五世紀三十年代，鄭和下西洋的航程中，隨行官員費信和馬歡留下《星槎勝覽》、《瀛涯勝覽》兩部遊記大抵初步描繪了我們後來在各種中國人行旅寫作中看到的新加坡和馬來半島的景觀。馬歡的《瀛涯勝覽》開宗明義表明，所有的紀錄為的是「採摭各國人物之醜美，壤俗之異同。與夫土產之別、疆域之制」。而馬敬的序言說得更清楚：「島夷之遠近，國之沿革，疆界之所接，城郭之所置，與夫衣服之異，食用之殊，刑禁制度，風俗出產，莫不悉備」。這類帶有考察性質的寫作，作者期許的最大意義是「諸番事實悉得其要，而尤見夫聖化所及，非前代之可比。」⁴這種發揚國威，宣導中華文明遠播的意圖，雖然不脫古代朝貢政治下的典型心態。但馬歡的記載，恰恰也是風俗記載。因此，同屬鄭和寶船隨行官的費信，留下的《星槎勝覽》記

1 安東尼·瑞德，《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第一卷季風吹拂下的土地）》（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11。

2 和辻哲郎，《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23。

3 參見田曉菲對十九世紀中國遊記對異域修辭策略的討論。田曉菲，《神遊》（北京：三聯書店，2015）。

4 馬歡，《瀛涯勝覽序》，收入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頁1。馬敬的序言也相近的表述：「欲使後之人，於千載之下，知國家道同天地，化及蠻夷，有若是之盛也。」

載途經的異國，兼有題詩描述其風土形貌。不同於《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著眼各國風土細節的敘述外，兼為每一方風土題詩，以下是費信停留馬六甲時，《星槎勝覽》留下的詩句：

滿刺村寥落，山孤草木幽。青禾田少種，白錫地多收。
朝至熱如暑，暮來涼似秋。羸形漆膚體，椎髻布纏頭。
鹽煮海中水，身居柵上樓。夷區風景別，賦詠採其由。⁵

詩句簡易清朗，屬五言古體，雖非竹枝詞常見的七言四句的形式，但描寫物種、氣候、人種膚色、生活習俗，基本內容和精神，實無異於竹枝詞的風土紀錄。

同樣處理接近新加坡海峽的龍牙門，自然景觀趨向白描，但意義涉及船行航道的各種地理考量：

山峻龍牙狀，中通水激湍。居人為擄易，番舶往來難。
入夏常多雨，經秋且不寒。從容陪使節，到此得遊觀。⁶

這是中國官員從海上接觸南洋群島的視野，那被處理和描述的景觀，總已涉及在知識框架內的命名與辨識，這大抵是南來的行旅者聚焦和定調的風土眼光。費信尤其強調，所有異域見聞的寫作，都有「一覽之餘，則中國之大，華夷之辨，山川之險易，物產之珍奇，殊方末俗之卑陋，可以不勞遠涉而盡在目中矣。」⁷這裡隱然帶出一個核心觀念，南來總涉及風土寫作，但漢詩世界內的南洋風土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觀念？我們該如何重新理解箇中內涵？

1900年因為邱菽園的資金接應，康有為避難流亡到新加坡並獲得上賓的招待。歷來討論康有為的南來意義，除了孔教運動和政治避難等議題，就其個人的詩歌譜系而言，南洋階段帶有創傷意義的漢詩寫作，無論是近代漢詩譜系而言，或馬華漢詩的意義，都有其特殊價值。康有為曾替邱菽園《選詩

5 費信，〈滿刺加國〉，收入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頁20。

6 費信，〈龍牙門〉，收入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頁5。

7 費信，〈星槎勝覽序〉，收入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頁10。

圖》題詠，既以「絕妙才華慘綠年」頌揚邱菽園的才華，亦不忘關注邱菽園在新加坡熱烈開展的文教活動：「君於居夷亦何陋，盡搜翠羽上紅氈」。對題詠者而言，南洋是炎荒之地，苦力與勞動百姓組成的移民社會。詩的風雅與生產，跟艱困窘迫的客觀環境有著弔詭的辯證。這是另一種南遷或南渡的正統，抑或境外蠻荒的變風？因此，當問及典章禮樂如何傳承，康有為直指南洋風土滋養的詩：

華夏文明剩竹枝，南洋風物被聲詩。蠻花駝鳥多佳處，恨少通才作總持。
中原大雅銷亡盡，流入天南得正聲。試問詩騷選何作，屈原家父最芳馨。⁸

他看到了南洋漢詩生產的可能意義。以南洋異域地景為竹枝詞的最佳素材，其實暗示了帝國崩毀，文化場陷之際，詩的禮崩樂壞就是大雅銷亡。詩的正聲不在雅樂，而是國風的民間魅力。跨出境外的漢詩，因此放逐天南，以民間歌謠形式重建詩的質感與動力。在康的身上，傳統屈原式的放逐詩學，為流寓者漢詩寫作的整體精神貼上了標籤。但南來的離散寫作，往往觸及雙鄉情結（double consciousness）。面對異地和異文化的接觸，文學形式表徵風土，成了一種處於兩種生活、習俗、城市、文化，甚至語言「之間」（in between）的議題。詩發生於當下，扎根於華人移民社會的歷史現場，間接成了風土的「形式」意義。換言之，南洋風土如何在民間歌謠和詩歌裡被承載和賦形，同時是我們觀察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新馬兩地報刊的竹枝詞、粵謳的其中一個重要面向。⁹其展現異於古體和近體漢詩的風格特色，似已標舉南洋風土的另一層意義。

在中國詩歌傳統中，竹枝詞帶有民間色彩，兼顧歌謠的口語、音樂特點，慣以七言四句，自由押韻的形式，歷來詩人創作不絕。竹枝詞隨著時代發展，從狀寫風物，進而議論時尚，描摹異地新奇事物。這反映了此文體

8 節引自康有為，〈題菽園孝廉《選詩圖》〉，《萬木草唐詩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117。

9 李慶年的《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是最初討論南洋竹枝詞和粵謳的學術專著。爾後接續編輯的《南洋竹枝詞彙編》、《馬來亞粵謳大全》，集中在報刊資料的收集，貢獻甚大。參見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彙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

的彈性，以及詩詞體式隨時代變化的應變策略。從十九世紀以降，詩歌經驗隨著文人的跨境遷徙而改變，竹枝詞也相應作為文人狀寫異地經驗的常見體式。田曉菲在觀察十九世紀中國行旅寫作時，特別強調「好奇」是竹枝詞寫作中試圖捕捉「風土」的眼光。

然而，我們習以為知的「風土」，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觀念？回到中國典籍，「風」從自然到教化，有幾層漸進的表述。《釋名》：「風，放也，氣放散也」，¹⁰《莊子·齊物論》：「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¹¹指空氣的流動狀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天子省風以作樂」，¹²《呂氏春秋·音初》：「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¹³則將「風」引導爲一種社會風尚、習俗、道德，一套對於「風」的人文主義認識，以及「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的把握似已初步完成。

與此同時，回應自然物理的狀態，人文意義的「風」必然旁涉「水土」概念，故《漢書·地理志下》：「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¹⁴言下之意，水土滋養民族性，風之形成，離不開水土，應運而生的土氣、土風等詞組，表示了自然環境與風俗習慣結合的意義。而慣用的「風土」兼具地理與人文雙重意涵，最能具體化地作為《詩經·國風》的詩篇採集民間聲音與風貌的底蘊，學者甚至以「風土詩」概括這類吟詠各地風土習俗以及時事的竹枝詞、雜詠、棹歌、柳枝詞等文學形式。¹⁵

在傳統醫療知識體系，「風者，百病之始也」(《素問·生氣通天論》)，¹⁶觸及身體意識。「風」在漢代兼具時間秩序的意義，左右季節的韻律，以及人

10 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27。

11 莊周著，郭象注，《莊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9。

12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625。

13 呂不韋著，高誘注，《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49。

14 班固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二》(臺北：鼎文書局，1986)，頁 1640。

15 最初提出「風土詩」概念的是周作人，見氏著〈關於竹枝詞〉。程潔沿用此詞，並考辨風俗、民俗、風土等辭源，強調「風土」內涵最寬泛，不僅關乎人文，還重視地理因素。見程潔，《上海竹枝詞》(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4)，頁 23-29。

16 劉之謙、王慶文、傅國志等編著，《黃帝內經素問吳注評釋》(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8)，頁 16。

的社會生活與行動準則。在中醫理論裡觀照的身體，風主導的時序，導引出一個跟身體發生連結與作用的意義脈絡。風與生命息息相關。

而走出國境到異域的風土寫作，「風」的概念除了是季候風帶動的海上行旅遷徙，以及「風下之地」的赤道自然地理環境，顯然更多了一層辯證。和辻哲郎《風土》一書特別強調自然不僅僅是風力、氣溫或濕度，而是與人互涉的感知類型或結構，這意味著風土是一種自我發現的機制。和辻哲郎這裡著眼的「我們在風土中發現我們自身」，¹⁷點出了南洋的風土類型背後，一種民族、人種應對環境形塑而成的社會具體實踐。在我們解讀的南洋竹枝詞和粵謳，中國南來文人又以什麼態度與眼光介入和捕捉這套風土的「物像」(image)或「物象」(object)？這套產生於生活的感受、景觀和脈動的寫作，風土被呈現的背後，如何指向文人自身的存在感？

我們不妨看看熱帶氣候的風土形塑的服飾和沖涼文化。以下的竹枝詞描述南洋人的生活以赤足拖鞋、沙籠著裝，以及沖涼解決酷熱：

終歲無分春與秋，薰蒸暑氣汗常流。五陵公子居此地，縱然冬天不用裘。
女郎著屐漢穿裙，每日街頭攘往紛。見慣司空不經意，隨波逐流可同群。
家家屋裡築涼房，每日房中沖水涼。細拭肌膚清潔淨，拖鞋囊囊步幽廊。¹⁸

從木屐、沙籠到沖涼房，作為熱帶氣候下的生活物象，進而關注女人著屐，男人穿裙、每日沖涼的一種生活習俗，南洋人隨著外在單調的自然炎熱環境而產生的相應變化，不妨視為一種起居意義上的身體律動。當寫入竹枝詞，進入南來者在異地的眼光，「見慣司空」和「隨波逐流」成為對異地熟習化的存在體驗，種種勾勒的南洋風貌，何嘗不是「風」土下，行旅者意圖融入異地而在竹枝詞裡組合、捕獲的一種節奏。

1950年代，南來文人蕭遙天曾以散文〈食風與沖涼〉¹⁹強調「好風有價」，「南洋人視風如食般重要」，這裡已是異域存在感的具體體現。他甚至將書齋以食風樓命名，刻意凸顯「洋樓」的雙關意義，呈現社會華洋雜處的居住欲望。食風，因此引出了一種風俗和風物下對生存的認知。無論是竹枝

17 和辻哲郎，《風土》，頁8。

18 不磨，〈南洋竹枝詞〉，收入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彙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頁110。

19 蕭遙天，〈食風與沖涼〉，《食風樓隨筆》（新加坡：蕉風出版社，1957），頁16-26。

詞、歌謠、粵謳或散文，這值得我們注意，南來文人以混雜方言與土語的華語語彙再現這一套生活風土之際，其實已是作為漢語流動下的在地實踐。語言離不開人的主體，無論自我表述、溝通與交際。風，因而作為一種身體的存在感與體驗，主體座標的確立和推移。尤其嵌入南洋語境，「風」帶動的華／夷想像，意味著一種裡外的對望與張望。

王德威教授曾對 Sinophone 的譯法，從習用的「華語語系」，改變或倡導更有文學表述意義的「華夷風」。²⁰ 當王德威進一步論述 Sino「phone / 風」總是在華語非華—夷—之間來回擺盪的聲納、風向、風潮、風物、風勢，²¹ 這恰恰對應了 Sinophone 的思考預設，宣稱「phone」/ 聲音在華語語系文化實踐的重要性。從一個移民社群的聲音表現而言，語言的駁雜、表述型態的歧異、溝通 / 交際的權力和資本、語言政策的實施與制訂，背後強調的認同與身份意識，處處涉及「聲音的政治」。史書美、石靜遠主張華語語系議題，其中一個核心面向，提及華語因移民的流動擴散形成「多音 (polyphonic)」、「多字 (polyscriptic)」的混雜與在地化現象，強調了「語系」特質。²² 然而，王德威主張華夷風，或「華語語系的『風』來回擺盪在中原與海外，原鄉與異域之間」，²³ 這是我們可以勾勒的「華夷風景」。王德威的申論，顯然意圖貼近一種文學與歷史的想像，恰如其分描述各種跨洋出境的風土。

1893 年，曾流寓印尼群島和新加坡的蕭雅堂發表〈新嘉坡竹枝詞十首〉，刊載於《叻報》，被認為是目前可見第一首的當地竹枝詞。其中兩首詩著墨了殖民地的華人風月場所，「聲音」的交織語境：

20 王德威除了有專文討論「華夷風」，另外聯合胡金倫和高嘉謙共同主編讀本《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以「地與景」、「聲與象」、「根與徑」、「史與勢」幾組概念閱讀相關文本。參見王德威，〈華夷風起〉，氏著，《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2015），頁 36。

21 王德威，〈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氏著，《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2015），頁 36。王德威同時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的序言，進一步申論：「風」是氣流振動（風向、風勢）；是聲音、音樂、修辭（《詩經：國風》）；是現象（風潮、風物、風景）；是教化、文明（風教、風俗、風土）；是節操、氣性（風範、風格）。

22 史書美對華語語系文學概念的定義，參見史書美，〈華語語系的概念〉，《反離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 5-25。

23 見王德威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的序言。

搖錢樹子一枝枝，缺舌方言恰費詞。安得花開能解語，夜來含笑話相思。
碧玉瓜破人已去，瓣香衰莫復披麻。郎今既死儂馬守，從此身同薄命花。²⁴

詩描述了南來新客在異地聲色場所的冶遊經驗，歡快後卻客死異鄉。妓院的相好為其披麻祭奠，卻想起彼此身世都是飄零的薄命花。有趣的是，這裡凸顯了「缺舌方言」作為移民社會妓院裡遭遇的特殊體驗。面對異地異族妓女，言語難以交流，身體語言反成了唯一的溝通手段，最終還是「夜來含笑話相思」。這是詩人在竹枝詞著眼的趣味，卻同時揭示了一個多音的風土。無論妓女是當地土生婦女，抑或同屬南來的淪落廣東女子，「缺舌方言」不僅僅是化用南蠻缺舌的傳統觀念，而是一個當地土語（馬來語）、殖民語言（英語），以及中國南方各種方言，並存於新馬華人移民社會的現象。

因此，南洋風土還有一個異地語言與華人方言群交際混合形成的觀察。十九世紀末在廣東地區發展的粵謳，這種民間歌謠形式隨著移民南下，在二十世紀初期成為新馬報刊發揚的文學形式之一。粵謳，又稱「解心」或「解心事」，本質是抒情為主調的風月詠唱，這一文體傳為招子庸（銘山，1793-1846）所創，其創作的《粵謳》（1828）被視為典範。招子庸是嘉慶丙子科舉人，招子庸《粵謳》（1828）可視為粵謳形諸文本的濫觴。代表作〈弔秋喜〉最能彰顯其音節諧婉，言淺意深，低回欲絕的情歌藝術，可謂粵謳的最初型態。然而，隨著粵謳的南渡，表現形式也混合了在地風格。這些粵謳不僅繼承固有的粵語形式，甚至混入當地馬來語形成獨具南洋特色的新馬粵謳。事實上，語言的混雜確實構成一個有效理解境外漢詩和粵謳寫作現象的要點。尤其早在 1890 年新加坡的粵語方言群就編輯出版了《馬拉語粵音譯義》一書，²⁵以粵語音譯馬來語，進行一種語言「翻譯」，這就不難想像這種語言的交雜、混用造成的影響，體現了移民社會現實的需要。這些方言群形塑的早期文學現象並非孤例。新馬地區還有海南移民的〈過番歌〉民謠，更遑論閩南、客家、福州等不同方言的歌謠普遍在新馬傳播和改編。在太平洋彼岸，廣東移民群體在舊金山創作的廣東韻文和民歌體詩篇，以《金山歌集》（*The Songs of Gold Mountain*）的面貌，準確描述了移民社會裡的庶民想

24 蕭雅堂，〈新嘉坡竹枝詞二首〉，收入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彙編》，頁 9。關於這是第一首當地竹枝詞，參見李慶年在序文的解讀。

25 （新會）馮德滋，《馬拉語粵音譯義》（星架坡：石叻兆興隆，1890）。

像，以及金山夢。這些俚俗為重的民間文學，調動方言語彙和民歌形式進行創作，在同屬韻文系統的漢詩譜系內，代表著境外共同的生產語境。因此粵謳和竹枝詞，體現了境外寫作的動力和能量，不容小覷。我們觀察近代詩歌文本，古體詩和歌行體形式甚為常見，方便融入更多新詞新語、異邦語言和複雜的新世界概念。而另一方面，漢詩也在漸進往「多音」實踐，調整詩的表現與承載形式。

無可否認，粵謳和竹枝詞在早期南洋移民文學有其重要的生產活力。相對士大夫雅致的漢詩寫作，精粹的詩語言，調度典故成辭不在話下。尤其寫作情懷往往包含濃厚的文化特質和想像。在史書美提出的華語語系概念，申論漢人移民者的定居殖民（Settler Colonialism）現象，展現對中國中心主義的批判。但漢詩恐怕是最具中國性特徵的文類和文體，那輕易套入的五言、七言格式，在民國以降沈迷舊體詩的郁達夫眼中，就是「骸骨迷戀」，顯然是帶有文化幽靈的鄉愁式招魂。除了部分漢詩因為音譯新詞新語入詩現象而突出了「語系」概念下多語特質，事實上，更多境外漢詩寫作如同中原生產，沒有多少「地方色彩」可以檢視。換言之，漢詩有其難以排除的悠遠傳統的語言表述形式，從組成的文字音韻肌理，到意境風格的奠定，難免都有固定的文化想像。但我們卻無法忽視，漢詩同時構成我們重新理解離散華人文學最早的文本之一，它是華人移民社群的文化生產，見證了從離散到在地移居的過程。從漢詩、竹枝詞到粵謳，不同形式的文體介入風土寫作，就華文文學的生產而言，我們更應該關注聲音與風土的交織面向。因此，新馬的粵謳寫作與登載，正好提出了一個粵語與華人移民社會的「聲音政治」，值得重視。

二、香港名伶廖俠懷的抗戰粵謳

1937年當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以粵謳和竹枝詞形式加入的抗戰文藝，率先以通俗化與大眾化的形式，在新馬地區回應了救亡的現實需求。其中粵謳從十九世紀末隨著南來文人的創作，而擴及新馬。邱菽園應是星洲最早關注粵謳的文人。一套民間的表述系統經由邱菽園的提倡，漸漸在廣府人

作為第二大方言群的新加坡受到歡迎。²⁶當 1901 年 1 月 25 日《天南新報》刊登了新馬第一首粵謳〈粵謳解心〉，²⁷印證了邱菽園最初關注星洲粵謳的努力。他對民間文學的有心倡導，粵謳終究透過其創辦的媒體，躍上公開的發表園地。

1902 年梁啓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小說》，內有「雜歌謠」欄目，以歌謠談文體改革和啓蒙，刊載的粵謳，直指家國啓蒙議題，文辭洗脫俚俗，展現新民效果。粵謳在晚清之際風行，大有取民間形式，擔負啓迪民智的功能。所謂「一省之方言，開一省之民智」。然而，這些新粵謳的作法，不見得是邱菽園在南來的那幾年，最爲關心或效仿的議題。尤其當邱叔園在麗澤社徵集竹枝詞和粵謳題，《新小說》尙未創刊。他對粵謳的倡導，以及寫作竹枝詞，可以投射出民間文類在華人移民社會的實踐，間接帶出一個晚清時期，文學接觸異地發展的語言生態。因此粵謳透顯的民間魅力，主要在其語言之靈動，且深入生活經驗。相對舊體詩的典雅與安穩，粵謳提醒了流寓文人面對的語言在地化問題與其應對策略。

我們關注粵謳具備的方言與聲腔特質，在語言大衆化的表述意義上，卻同時凝聚了族群的接受與認同。回到華僑抗戰動員的脈絡，星洲的粵語人口，藉由粵謳的歌詠吟唱、靈活語彙，帶有警世諷諭、嘲諷笑罵的題詠形式，準確並立即回應了抗戰的「現場」。這是將南洋華僑引入中國抗戰序列，產生共鳴的民間文體。我們恰恰透過粵謳的生產型態——素樸的方言群認同、口語見長，生動辛辣、直接觸動現實經驗，呈現了南洋華人面對抗戰的時代感覺。

1939 年 5 月至 7 月，新加坡發行的《南洋總匯新報》陸續刊載了多篇廖俠懷的抗戰粵謳。該報是《南洋總匯報》於 1908 年歷經改組後的新面貌，在二十世紀初期具有濃厚的保皇色彩，與主張革命立場的《中興日報》壁壘分明。最能具體展現粵謳「戰鬥」特質的語言表現，當屬《南洋總匯新

26 根據麥留芳的數據觀察，從 1891-1941 年廣府人在檳城與新加坡都是第二大方言群。而最大宗的方言群始終是福建人。參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頁 70。

27 參見李慶年，《馬來亞粵謳大全》，頁 31。

報》以連篇累牘的粵謳對《中興日報》社論的攻擊和回應。²⁸該報不但是新馬兩地在戰前最後刊載粵謳，也是歷來刊載粵謳最多的報刊。廖俠懷的抗戰粵謳是最終見報的作品，體現了熱血抗戰之外，帶有諧趣、嘲諷、批判的一面。這是投向華人社會，聲情交織的戰場見聞和現形記。

廖俠懷（1903-1952），祖籍廣東新會，出生於南海西樵。曾在廣州當鞋店學徒、報童，在上夜校期間熱愛粵劇，後到新加坡工廠當工人。由於業餘參加當地的工人劇社演戲活動，被粵劇名小武靚元亨到新加坡演出時意外發掘，才華受到肯定，收為徒後，改藝名「新蛇仔」，從此踏上專業演戲之路。1920年代後期，廖俠懷回廣州先後在梨園樂、大羅天、新景象、鈞天樂等戲班演出，領導廣州的「日月星」和「大利年」劇團，成為粵劇廖派藝術創始人，為四大名丑之首。他也是改良粵劇的領導者，推動粵劇的革新改良，有巨大貢獻。

事實上，廖俠懷的經歷頗為有趣。曾在新加坡當勞動工人，爾後在廣州、香港成為粵劇名伶，寫作的粵謳卻刊載於新加坡報刊，反映了他的抗戰粵謳，有其熟悉和掌握的南洋華人世界。面對抗戰需要投入的物力與人力，〈退一步想〉和〈君你有本事〉標題直指人心：

〈退一步想〉

勸僑胞努力輸財拯救難民

退一步想，就海闊天空，將人比己未必我係真窮。錢無帶入棺材其實有用。知否 哀鴻遍地宿露餐風！你睇天人交逼係咁災情重，重有難民恃最未得詐作痴聲，自己都重衣食無虧唔受苦痛！咁就要盡力維持積吓陰功。見義不為，就係真無勇。宜自訟，浮生都若夢，情願節衣縮食都要善與人間。（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九日），頁 242。

〈君你有本事〉

君你有本事，不若返去唐山，唐山世界有咁艱難。投筆從戎，我話勝過異鄉長嗟歎，因為政府正在招羅賢士去保護江山，為國宣勞至得人稱讚。倘

28 參見李慶年，〈馬來亞粵謳的起源與概況〉，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頁 1-29。本篇引用的廖俠懷粵謳，均出自此書。引文僅標示頁碼，不另加註。

與草木同腐未免太平凡。若果無意還鄉要把實業辦，後方生產亦共救國有關。飽食終日容易大食懶，一盤散沙咁散，悔時悔晚重怕水剩山殘。（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頁 242。

〈退一步想〉既勸人要「積嚇陰功」，又不忘開解人生「浮生都若夢」，甚至讚揚華僑「情願節衣縮食都要善與人間」，文字淺白生動，朗唱之間，對華人移民社會養成的性格和習性，非常熟悉。〈君你有本事〉則語帶挑釁：「君你有本事，不若返去唐山」，鼓勵華僑北返從軍，又不忘提醒投入實業生產。但激勵的基礎，在於看穿華人移民社會「一盤散沙咁散」的特質。這替慣以謀生賺錢的華人，注入一股民族想像，「水剩山殘」的亡國意象，化爲口語動詞「悔」、「剩」、「殘」，俐落、直率，指向戰火實況。

1939 年戰爭有擴大趨勢，廖俠懷關注南洋局勢的變化，對英軍統帥蒞臨星洲頗有期許。試觀以下文辭：

〈東風有力〉

英軍駐馬來總帥抵星後

東風有力，花事賴你扶持，莫使摧花人仔折剩殘枝。因謂綠瘦紅肥正愁秋又至，恐怕護花無日咯正在皺住雙眉，得你此來自是偷歡喜，花叢呢陣一定有生機，怕乜佢蕭索秋風帶住的嚴肅氣，咁就花欄築起唔駛葬在春泥。東風你又切莫好似往年霎眼隨春去，就算一年四季可否好似今日咁依依，更莫使綠葉成陰枝滿子。人人都向你指意，指意你東皇有力保得花好到長期！（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頁 250。

〈東風有力〉化用「東風無力百花殘」，借花託喻，花叢的生機賴於總帥駐守，可以穩住星洲局勢，自然「咁就花欄築起唔駛葬在春泥」。潛藏的落花意象貫穿全詞，似有預感新馬有陷落之虞。因此，「人人都向你指意，指意你」，家常口語，卻簡潔有力。期許「東風有力」，花草依依，「保得花好到長期」。譬喻淺白生動，「東風有力」雖帶諧趣，卻又難掩落花的危機。此闕粵謳恰似讖語。兩年後英軍面對日本攻擊，僅抵抗十五天就棄守，新加坡淪陷。

同樣在華僑世界容易引起共鳴的抗戰議題，還包括汪精衛的出走河內及參與和平運動。王精衛早年追隨孫中山在新馬宣揚革命，娶檳城女子陳璧君爲妻，在南洋有地緣關係，名聲響亮。1940 年汪政權在南京登場，汪精衛從

此惹上歷史罵名。廖俠懷狀寫汪的醜角形象，多少受到其時重慶政府主導發行的各種批判汪的言論、書籍和雜誌的影響。試看粵謳裡批判汪的形象：

〈唔到你賴〉

聞汪傀儡登場

唔到你賴，監硬話清白無瑕，可惜你成身花債個底子已差。相好咁多真係得人怕。而家居然出局咯有案可查，咁樣子嘅女人唔愛就罷，一任佢飄萍斷梗墮落煙花。事到如今我亦無口話。世情都睇化，講乜野舊時恩愛與共當日繁華。(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六日)，頁 246。

從影射汪的水性楊花，批判其投入日人懷抱另組政權。但此粵謳同時回應了汪精衛蟄居河內後寫成，寄給重慶的黨國要人的詞作〈憶舊遊 落葉〉。該詞寫來迂迴婉轉，茲錄於此：

〈憶舊遊 落葉〉

歎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颿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擎空枝老，同訴漂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撼撼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只極目煙蕪，寒蟄夜月，愁秣陵。²⁹

汪的原作帶有滄桑情調，以落葉破題，經營蕭瑟景象，寄寓抗戰前途黯淡，而個人毅然投身和平運動，招引的誤解詆毀，只能託付落紅流水，希望自己的情操與胸懷，可以留下餘馨。不過，這番陳述，顯然未獲過往的同志的善意解讀。吳稚暉的點評與唱和，刻意置換其中關鍵意象，指出「恨少貞堅質，受嚴霜小逼，墮作漂萍」。因此原本落葉的無奈，成了自甘墮落的象徵。吳稚暉以詞唱和，雖不乏諷刺，但尚且含蓄。廖俠懷訴諸粵謳的表述更直接露骨：「一任佢飄萍斷梗墮落煙花」，以墮落為煙花女子，直指汪的投敵落水。

29 詞作最初轉載於 1939 報刊，第二闕的末句，原為「只極目煙蕪，寒蟄夜月，愁秣陵」。除了逸，〈汪精衛賣國付「東流」 吳稚暉填詞掃「落葉」〉，《雜誌》4.5(1939): 23，又見逸，〈汪逆賣國付「東流」 吳老填詞掃「落葉」〉，《文獻》8(1939): 158。刊載於《同聲月刊》的版本，除了簡別用字有異，末句已改為「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見《同聲月刊》1(1940.12): 116。又見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稿》(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2)，頁 306-307。

汪的事蹟在南洋無人不知，粵謳標題「唔到你賴」，對照汪精衛詞作的迂迴，直率有力，拆穿其「成身花債」的底細。汪出身廣東，自然看懂粵謳。此作刊於星洲自有深意，既揭穿他在南洋擁有良好革命形象，也回應了華僑抗戰的心理建設。其時汪出走河內，新馬的討汪活動激烈。報紙不時出現各種「反汪運動」的宣傳，當地華校師生更進而舉辦反汪大會。³⁰陳嘉庚為首的僑領甚至積極拍電報給蔣介石、林森，要求國民黨對汪發出通緝。可見汪的另組政權，對華僑投身抗戰的熱血情感造成的傷害。因此，「講乜野舊時恩愛與共當日繁華」，已是分道揚鑣後，對汪的背叛一種帶有情傷的指控。看在南洋讀者眼裡，自然多了一分複雜滋味。粵謳帶動的華僑方言政治，營造了另一種抗戰實踐。

抗戰粵謳在新馬報刊的出現，凸顯了舊形式帶動的華民族情懷的投入和想像。這不僅是通俗或大眾化的形式，而是積極介入現實，以口語朗讀的趣味、詼諧和共鳴取勝的文體形式，將戰時見聞訴諸筆墨。

綜合而言，新馬地區從華人響應中國抗日到自身淪為殖民地，粵謳這類舊形式的重啓活力，不該只純粹視為為救亡文學下的通俗化或大眾化策略，甚至也有新文人眼中「為舊形式『服務』，被舊形式所『俘虜』」的憂慮。³¹粵謳對華僑投入對日抗戰的動員，到新馬陷入大東亞戰爭的烽火中，其生生不息，潛藏著內蘊的活力，反而預示了一種文體內部的必然實踐與轉化——詩與史的滑動。新馬粵謳因而值得重新檢視，觀察方言韻語在救亡的中日抗戰文學，與紀史的新馬戰時文學脈絡下，如何有效發展為一種帶有民族形式的認同，甚至帶有一種華人共同體性質的社會現實的賦形。換言之，二十世紀上半葉浮現於新馬報刊裡的粵謳，無論是在場的文人創作，抑或從嶺南、港澳的投寄或轉載，粵謳跟南洋風土的辯證，恰恰提示了一種粵音風土，同時可視為文學與文化意義下，華人社群的粵語政治。

30 相關報導甚多，如〈再斥汪逆並告馬華僑胞〉，《南洋商報》（1939年6月3日）。丹里，〈展開全馬反漢奸反汪派的鬥爭〉，《南洋商報》（1939年8月5日）。〈甲華學生界舉行反汪大會〉，《南洋商報》（1939年12月12日）。

31 雲端，〈通俗化在馬來亞〉，收入方修，《馬華新文學大系（1919-1942）：理論批評二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大眾書局，2000），頁117。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莊周著，郭象注，《莊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呂不韋著，高誘注，《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班固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二》，臺北：鼎文書局，1986。
- 漢·劉之謙、王慶文、傅國志等編著，《黃帝內經素問吳注評釋》，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8。
- 明·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
- 明·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
- 清·康有為，《萬木草唐詩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清·馮穗滋，《馬拉語粵音譯義》，星架坡：石叻兆興隆，1890。
- 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二、近人論著

- 〈甲華學生界舉行反汪大會〉，《南洋商報》，1939年12月12日。
- 〈再斥汪逆並告馬華僑胞〉，《南洋商報》，1939年6月3日。
- 不 磨 2012 〈南洋竹枝詞〉，收入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彙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頁110。
- 丹 里 1939 〈展開全馬反漢奸反汪派的鬥爭〉，《南洋商報》，1939年8月5日。
- 王德威 2015 〈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2015，頁36-50。
- 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 2016 《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
- 史書美 2017 〈華語語系的概念〉，《反離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5-25。
- 田曉菲 2015 《神遊》，北京：三聯書店，2015。
- 安東尼，瑞德 2010 《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第一卷季風吹拂下的土地）》，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 李慶年 2012 〈馬來亞粵謳的起源與概況〉，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頁1-29。
- 李慶年 1998 《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李慶年編 2012 《南洋竹枝詞彙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
- 李慶年編 2012 《馬來亞粵謳大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
- 汪精衛 2012 〈憶舊遊 落葉〉，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稿》，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2，頁 306-307。
- 和辻哲郎 2006 《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麥留芳 1985 《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 程 潔 2014 《上海竹枝詞》，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4。
- 逸 1939 〈汪精衛賣國付「東流」，吳稚老填詞掃「落葉」〉，《雜誌》4.5(1939): 23。
- 逸 1939 〈汪逆賣國付「東流」吳老填詞掃「落葉」〉，《文獻》8(1939): 158。
- 雲 端 2000 〈通俗化在馬來亞〉，收入方修，《馬華新文學大系（1919-1942）：理論批評二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大眾書局，2000，頁 115-118。
- 蕭雅堂 2012 〈新嘉坡竹枝詞二首〉，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彙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頁 9。
- 蕭遙天 1957 〈食風與冲涼〉，《食風樓隨筆》，新加坡：蕉風出版社，1957，頁 16-26。

Local Cultures and Customs at the Equator: Cantonese folksong and Bamboo-twig Poetry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KO CHIA CIAN*

Abstract

In regards to narrative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migrations or diaspora, the notion “southbound” (*nanlai* 南來) represents the economy and labor mobility in *Nanyang* and symbolizes the geographical traces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diffusion, which deserves further analysis. Migrations and diasporic literati constituted a context in which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originated and formed both the early literary circles and produc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two regions. The immigrant society was comprised of dispersed Chinese with various dialects, and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Han poetry, Cantonese folksong (*Yue ou* 粵謳) and bamboo-twig poetry (*zhuzhi ci* 竹枝詞) were two other common literary forms depicting local custom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se writings not only touch upon the survival experiences of the emigrants’ subjectivity, but simultaneously highlights the encounters, changings and developments of languages in a foreign land, which gave rise to the imaginations of the literati towards their emigrant society and homelands.

This article looks at how Cantonese folklores at the time during the Great East Asian war and bamboo-twig poetry—written by those diasporic Chinese who crossed Southeast Asia and came in contact with cultures near the Equator—became

* KO CHIA CI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ssential literary forms describing local customs, and in turn, allowed the writers to engage in reflection.

Keywords: bamboo-twig poetry (*zhuzhi ci*), Cantonese folksong (*Yue ou*), *Nanyang* Topography, Diasporic *Han* (Chinese) Poetry,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